

家父、歷史與我

Life can only be understood backwards ; but it must be lived forwards.

Søren Kierkegaard (齊克果)

王孟亮

國立中興大學獸醫系教授



* 我是在一本獸醫內科學的教科書 (Stephen J. Ettinger and Edward C. Feldman , Textbook of Veterinary Internal Medicine. 5th edition, 2000, W.B. Saunders Co.) 的序言看到這句話。

非常抱歉，可能好像臺語所說的「近廟欺神」，我對家父的職業及工作內容非常不了解。2011年2月15日，我和黃秀政教授通電話，在電話裡，黃教授說他向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的《臺灣文獻》的編輯委員們建議我寫一篇有關家父的文章。我向黃教授表示，我真的不了解家父的工作，但黃教授說我可以用家人子女的觀點寫一些，我就勉強接下這個工作，零零碎碎寫了這篇短文。

家父生於昭和3年（1928年），長大後從日本時代變成中華民國的時代，他也就不得不趕緊學中文。我對他學中文的詳細過程並不知道，竟然沒多久家父就能用中文寫作。但我知道很多和家父年紀相近的人，中文學不好，這造成他們後來在社會上的發展受到限制。我總感覺家父有臺灣漢人文化（例如：他虔誠祭拜神明祖先，也瞭解祭拜的禮儀細節）與日本教育（例如：從庭院到棉被枕頭的整理，他的家居生活習慣比較接近日本的清潔整齊）的影子，但並沒有受到中國文化教育（例如：他沒有念過所謂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影響。

家父走上臺灣歷史研究這條路，是有點偶然。他向我說，年輕時當小學老師，社會不安定，有時好幾個月也領不到薪水。是樹林的賴翔雲先生介紹，黃純青先生的厚愛，引他進入臺灣省通志館。

有關家父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文獻會）的同事相處，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訪問紀錄（許雪姬，劉素芬，莊樹華訪問，丘慧君紀錄，《王世慶先生訪問紀錄》，2003）中，大多已談到。但有件事我認為值得在此向大家補充，就是家父的那位東北同事賀嗣章先生。家父說賀先生在滿洲國時和岸信介很熟，日本戰敗後，岸信介來臺灣訪問好幾次，幾乎每次來臺灣，岸信介都會和賀先生見面（當時文獻會在臺北市）。岸信介來臺灣，和他見面的大多是有受日本教育的黨國大老（例如：張群、何應欽等）。以當時的環境和這種人脈關係，我想如果賀嗣章先生想透過岸信介幫忙，離開文獻會這個地方，去獲取最佳的職位，應該是沒問題的。但賀先生每次就是和岸信介見見面而已。

此外，文獻會的同事毛一波先生對家父也很信任。毛先生退休後前往美國和兒子同住，但有關退休之後一些金錢的事（與保險金、年節禮

金之類相關的錢），他都託家父辦理，印章和有關文件就放在我樹林鎮的家。

中央研究院許雪姬教授等人為家父做訪問紀錄，除了為家父歡喜之外，我更覺得透過對家父的訪談，讓和家父同時代的研究者（有很多人比家父年長，又大多已經逝世，例如：王詩琅、廖漢臣、毛一波等人），能有再次曝光的機會。這些人，因為時代環境的關係，沒有留下比較詳細的訪談紀錄，實在真可惜。此外，據我所知，文獻會的同事，年紀比家父大的，只有住在臺北木柵的陳石先生仍健在，大約半年前，他來臺北家中看我父親。陳石先生的身體仍然健康。

很久以前，家父就曾經跟我提過，他說有一位來文獻會訪問的日本學者，向他說臺灣人寫的研究日本時代的文章，幾乎都是做抗日方面的研究。我想這位日本學者後來應該知道當時的政治環境，做臺灣人抗日的研究才安全，如果以其他角度來看日本時代，可能會失去工作，甚至被抓去關（家父也看到一些和他一樣受過日本教育的人，並沒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困難處境，卻去做思想言論檢查的幫兇）。事實上，這也是家父走入臺灣史研究時，選擇研究清代臺灣社會經濟的重要原因。

家父對於相當有才學的林衡立先生，不能發揮所學，一直感到相當遺憾。但林先生是家父一輩子多年的前輩，也是很好的朋友，幾年前，林衡立先生過世，我陪家父去參加他的告別式。林先生的告別式那天，大多是他的親戚來參加，我想臺灣的研究機構或大學的人，大多不知道他的死亡消息。相對於林衡立先生，他的兄長林衡道的名聲較為人知。

家父的日本同行友人也不少，但我稍微知道的只有中村孝志，森田明等人。這些日本學者我都沒看過，森田明教授是去年來臺灣參加黃富三教授的退休學術研討會（2010年9月），我陪家父一起去南港中央研究院，才有一面之緣。在準備這篇文章時（2月21日），我得知森田明教授要來臺北參加家父的告別式公祭。森田明教授遠從日本來，他年齡已經相當大，令人感動。

比家父年輕的臺灣文學研究者河原功先生，我見過三次（第一次

在東京，第二次他來臺北市新生南路我的家，第三次他和妻子來臺北市仁愛醫院的靈堂向家父上香）。我之所以會在東京和河原功先生見面，是因為2007年7月，我和麗莉帶四個兒女去日本觀光，我向家父說我想去東京的成蹊學園看看（只因為這個學校是以《史記》中的〈李將軍列傳〉的諺語「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命名的），而我對當年在臺灣大學大一教的李將軍列傳印象深刻），家父向我說，這個學校他認識一位名叫河原功（成蹊高等學校）的教師。我事先沒有約定，就直接向成蹊學園的人說我想見一下河原功先生，很巧他剛好就走到學校大廳附近，我就自我介紹說我是臺灣王世慶的兒子（當時，是由中興大學獸醫系博士班畢業的渡邊裕子當翻譯），簡單交談幾句話並照相就離開成蹊學園了。

有些認識我的人，認為我略有文史的癖好，可能是受到家父的影響。其實，家父很少和我談有關他的研究內容，而我也不會主動去問他。在他眾多的論文當中，我只有大約在4、5年前和他談到他那篇〈日據初期臺灣之降筆會與戒烟運動〉（《臺灣文獻》，第37卷第4期，1986年）。我之所以看一下這篇文章是因為我和他聊起臺北市永康街及潮州街交口處的「昭和町市場」，有一位張大成先生，收藏很多有關臺灣吸鴉片的史料及吸鴉片的器具，於是家父向我說他寫過這麼一篇有關戒鴉片的文章。我也是從這篇文章才知道日本剛統治臺灣時，鴉片癮者的人數大約有170,000多，佔當時全臺灣總人口的百分之6.45，而到了昭和16年，臺灣人仍有8,500多人持有吸鴉片的執照。

我高中選擇甲組（理工科系），後來畢業於臺大化學系，但好像大約40歲左右，我漸漸對科學的歷史產生興趣（就是發自內心的原因，沒有外來的因素），也在一些國際期刊（*EMBO Reports* 和 *Nature* 等）發表一些有關科學史的小意見（真的很短小，最多一頁）。我覺得，如果當年我不念甲組，我應該會選擇歷史系作為我考聯考的第一志願。

最近4、5年左右，從閱讀一些老舊的文章中，我對章學誠和劉知幾兩位史學評論家，產生興趣。只要舊書店有看到跟這兩位有關的書，我幾乎都會買，幾年下來，章學誠的著作或有關他的書，也大約買了7

本），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我也只是簡單瀏覽，佩服其中的一些看法及優美的文句。在劉知幾與章學誠所處的環境，科舉功名利祿才是所謂讀書人重視的，他們「無同好」，他們所投入的是「寂寞之途」的史傳工作。當然，1945年之後，在臺灣念歷史系的人都知道這兩位史學評論家，但我知道，家父一輩子都沒聽過章學誠、劉知幾的名字。對我而言，我從中學念到大一的中文及歷史，幾乎沒有人向我提起這兩位的偉大貢獻（或許在課文中一筆帶過，但他們兩位絕對不是考試的重點）。

我個人對歷史一點點的癖好，只是增加一些生活樂趣。如果一個人的癖好能非常深入，像晉朝的杜預，那應該是最福氣的事情了。杜預向皇帝說，他有「左傳癖」。杜預有他在俗世的功績名聲，但是他業餘的左傳癖，讓他名留千古（「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晉書》〈列傳第四〉）。

雖然家父已離開這個世界，但我想他的研究工作的價值及功用有待時間的考驗。常言文章是「得失寸心知」，他知道自己寫的東西有些比較有價值，有些可能只是平平。家父從事論文寫作總是很仔細，力求內容的正確。宋朝的歐陽修說他自己的文章，「不畏先生嗔，卻怕後生笑」，大概所有寫文章的人都會有這種感覺。

最後，多謝《臺灣文獻》的編輯委員等人給我這個機會，藉這篇短文，我感謝家父的國內外長輩、同事、朋友及臺灣史學界後起之秀，對家父的愛護、幫助與肯定。（2011年2月22日）

後記：

公祭那天（2011年2月27日），日本兵庫教育大學的松田吉郎教授是由張炎憲教授代念祭文，人沒有來臺灣。3月8日松田教授來臺灣，來臺北家中向家父上香。（2011年3月9日補記）



這是他最後在辦公室的留影。
(2005年7月4日，康麗莉攝影)



這是家父與作者(左)去南港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將他個人的書籍資料搬回樹林家那天的照片。
(2005年7月4日，康麗莉攝影)



松田吉郎教授(右) 3月8日來臺北家中向家父上香後與作者合影留念。(康麗莉攝影)